

奏疏一

陶澍全集



陶澍全集

奏疏一

岳麓书社

新解
PDG

前言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晚年自号“髹樵”、“桃花渔者”。湖南省安化县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四川乡试副考官、监察御史、户科给事中、川东兵备道；道光年间，历任山西省按察使、安徽省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道光十九年（1839年）病逝于官邸，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

一、陶澍的历史地位

陶澍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杰出的政治家与经济改革家，在中国古代与近代之交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他是传统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代表，又是古代经世学派转变为近代洋务派的关键人物，他还是湖南由产生个别杰出人才到产生人才群体的先导。

（一）陶澍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代表。

经世学派又称实学派，其特点是主张“通经致用”，即发扬儒家学说的精华，用以解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反对空谈，反对只把学问作为猎取个人功名利禄的狭隘工具。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颀、颜元等都是经世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清初屡兴文字大狱，压制并迫害有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

未能尽展其才。

2 陶澍既具经世思想，又生活于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时代。从客观环境看，从乾隆末年开开始，特别是到了嘉庆、道光时代，朝廷多次下谕禁止文字狱，宣布广开言路，于是“人心渐获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经世派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政治机会。经世派的官吏们，关心吏治民风、河工水利、救灾赈饥、军事边防、盐课漕运等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主张改革弊政。也就是说，“经世致用”由思想准备发展到了具体实施的阶段。从主观方面看，陶澍既具有经世思想，又是掌握东南经济命脉的大臣。他力主通经致用。他说：“通经学古而致诸用。”（《尊经书院课艺序》）“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钟山书院课艺序》）又说：“今日之士子，即异日之官吏。当其为士，尚不能耐苦，又安望身处脂膏能廉于守？当其为士，尚不肯究心，又安望躬膺繁剧能勤于职？不廉，不勤，则吏治坏而归害于民。”（《山西晋阳书院告示》）

陶澍的学问，以儒家的经典为主体，但又广泛吸收其他各家学说的精华，并且精通考据之学。他自觉地运用这些思想主张与思维方法指导实践，所以往往能够高瞻远瞩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赈灾、水利、吏治、漕运、盐政诸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兴办教育、严禁鸦片、改革币制等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如：陶澍在担任安徽、江苏巡抚的八年期间，据《清实录》统计，共主持大的赈灾事项 34 次。陶澍赈灾的特点是能够全面了解情况，关切灾民，制定周密的方案。他在《缕陈灾务积弊折子》中，分析胥吏、乡保、刁棍等借赈灾而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十项积弊，提出治弊四法；又在《缕陈江苏办灾章程折子》中提出十二条赈灾章程，全面关心灾民的当时生活及灾后重建家

园、恢复生产。陶澍分析天灾频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水利不修，于是实地考察，兴修水利，先后疏浚了淮河、洪泽湖、黄浦江、吴淞江、浏河、得胜河、澡港、白茆河、孟渚、练湖。这些水利工程，改良了两江地区的生产环境，提高了抗灾能力，“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清史稿·陶澍传》）。又如：漕粮运输，是清王朝的生命线。朝廷每年要从南方征调约 400 万石漕粮供应京师。两江三省（江苏、安徽、江西）的漕粮几乎占全国漕粮的一半以上，而且浙江、湖广的漕粮，也要经过江苏北上。可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漕运已成不治之症”（林则徐《复陈恭甫书》）。一是漕运机构日益庞大，负责运输的旗丁及官吏、衿棍、奸商互相勾结，弄虚作假，夹私盗卖，并对百姓乃至对地方官盘剥勒索；二是运河淤塞，水患不断。陶澍到任后，从四个方面改革漕运：一是删浮费、禁勒索，二是裁陋规、严制度，三是治江河、浚运道，四是细策划、倡海运。这些措施既保证了漕运，又减轻了人民负担。其中的提倡海运，实际上开了近代运输改革的先河。

陶澍改革盐政的成绩更是举世公认。盐税是历代王朝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商人运销食盐，必须向朝廷纳课，由户部发给凭证，叫做“盐引”或“盐钞”。盐课约占清政府税收白银 20% 以上，而两淮盐课又占全国盐课的一半以上，“淮盐课额，甲于天下。……以一隅抵数省之课，正杂各项，数至七八百万两”（陶澍《沥陈淮鹺疲困、办理竭蹶情形折子》）。清朝实行的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纲盐制”，即扶植一批富商充当“纲商”，规定他们每年可以领运多少盐引，其他人不能参与贩运。纲商所垄断的盐引，叫做“引窝”或“根窝”。盐引由纲商所垄断。这种不合理的体制，利于总商的把持垄断，利于官吏的中饱私囊、因循敷衍。受到特权保护的官吏、纲商、旗丁等，长期垄断盐务，终于造成

祸国殃民的两大严重后果：第一是盐价昂贵、民不聊生。根据陶澍奏疏及有关资料记载说，淮盐的出场价每斤仅铜钱一二文或三四文，加上缴纳给国家的盐课，成本价也不超过七文，但是，销盐口岸的每斤卖价达到六七十文，甚至八九十文，奸商、水手们还在食盐中掺和污泥、皂荚、蛤灰，“以致江广之民，膏血尽竭于盐。家贫小户，往往有兼旬弥月坚忍淡食，不知盐味者”（《敬陈盐务积弊折片》）。第二是税收亏欠、库储全空。官盐卖不出去，年复一年，两淮盐务部门亏欠应该上缴国库的税银达四千多万两，而且把朝廷发下的一千多万两借本也花光了。到道光十年陶澍擢升两江总督时，两淮盐务几乎完全瘫痪，正如钦差大臣王鼎与陶澍在《会筹两淮盐务大概情形折子》中所说的那样，“通纲情形全属涣散，已等于停运停销”，“山穷水尽，不可收拾”。于是王鼎不得不向皇帝建议，由总督陶澍兼管盐政。陶澍受命于危难之际，提出了盐务章程十五条，包括裁减浮费、裁选总商等主要内容（《会筹盐务章程折子》）。接着，又在《筹议加斤减价、兼疏积引折子》中提出了“减价敌私”的经济手段，然后在淮北滞销口岸实行“票盐”，让普通商人也可以依法请票，贩卖官盐，彻底打破官商的垄断。改革之初，阻力很大。《清史稿·陶澍传》说：“窝商、蠹吏、坝夫、岸胥，一旦尽失其中饱需索之利，群议沸腾。言官摭浮言，屡事弹劾。”陶澍力排众议，毅然坚持，终于成功。他担任两淮盐政八年，到道光十九年因病重卸任时，两淮盐务出现了大好局面。一是盐销，官盐价格大大降低，盐引畅销；二是课裕，不仅完成了每年征收上缴国库的盐课银，而且偿还了历年的积欠；三是民便，贫苦百姓买得起食盐，贫苦灶民避免了中间盘剥，不少私枭化为良民；四是商利，打破官商蠹吏的垄断，保护了普通商人的合法利益。后来，淮南、河东、闽浙等地的盐

场，也实行票盐。所以，研究中国盐业的专家曾向丰说：“综观历代盐政，极为繁复。其办理较有成效者，除春秋之管仲、唐之刘晏、清之陶澍外，几不多见。”（《中国盐业之动向》，载《东方杂志》34卷7期）

陶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使他成为公认的经世学派代表人物。魏源《陶文毅公行状》总结陶澍的政绩说：“公自任督抚以来，如漕务之创海运，三江之修水利，淮南之裁浮费、截粮私，淮北之裁坝杠，皆恒情所动色相戒，公奋不顾身，力排众议，卒能创始善终，可久可大。而海运、盐票，尤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现代学者孟森的《明清史讲义》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

5

（二）陶澍、贺长龄、林则徐和魏源，是经世派发展为洋务派的关键人物。

任何社会运动，都是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社会流派的出现，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开明派官僚与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其领导人物都具有“经世致用”思想。洋务运动，在本质上是经世派面对资本主义列强所作出的政治回应。

洋务派与经世派具有最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关心时务，把学问与解决国计民生大问题结合在一起。陶澍、贺长龄、林则徐对魏源的任用，颇具有典型意义。魏源贯通经学，跟陶澍是世交。道光五年，陶澍调任江苏巡抚，贺长龄任布政使，魏源是贺长龄的幕僚，同在苏州。两年后，魏源转为陶澍的幕僚，直到陶澍逝世。在陶澍的领导下，贺长龄、魏源积极参与筹划赈灾、水利、

漕粮海运、盐政改革等大事，贺长龄并托魏源主编《皇清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汇编了清朝中叶以前中国社会处理政治、经济、军事等国计民生实际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是经世派的经世巨著。后来，林则徐到江苏先后担任布政使、巡抚，也成为陶澍的重要助手。陶澍逝世第二年发生鸦片战争，琦善主和，林则徐被撤职。翌年，主战派钦差大臣裕谦奉命办理浙江防务，林则徐奉命协助裕谦，魏源曾经进入裕谦幕府，积极筹划抵抗侵略者。战争失败后，魏源受林则徐之托编成《海国图志》，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从《皇朝经世文编》，到《海国图志》，实际上勾画出了经世派发展为洋务派的时代轨迹。

为什么说陶澍是由经世派发展为洋务派的关键人物呢？陶澍在鸦片战争前夕已经逝世，他没有直接跟资本主义列强交手，但是他在许多方面作了洋务运动的先声。

首先，陶澍与洋务派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洋务派的核心目的是富国与强兵，在这两个方面陶澍都是先导。陶澍改革盐政、改革漕运、兴修水利，充实了国家抗击侵略的力量，就是富国的具体行动。刘广京为《陶澍在江南》一书写的序言说：“陶澍和林则徐是道光朝群吏闾茸中两个最杰出的人物。林则徐的历史意义在于认真查缴鸦片，不屈不挠，促成不可避免的中英战争……陶澍的重要性则在于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于江南漕、盐、河三大政尤有其切实的贡献。内政和外交同样重要，甚至说内政比外交更重要，陶澍与林则徐两人在历史上地位的高下是很难判别的。”而且，陶澍一直关注国家的军事力量，更是主张严禁鸦片的政坛领袖人物。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陈奏《严禁漏卮以培国本疏》，主张用重典严禁鸦片，清廷将黄爵滋的奏

折交各省督抚筹议。当时，上疏反对黄爵滋意见的督抚有直隶总督琦善等 20 人，上疏赞成黄爵滋意见的督抚仅有 8 人，包括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江苏巡抚陈銓、安徽巡抚色卜星额等。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是陶澍的下属，林则徐过去也是陶澍的下属。陶澍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子》，力主严禁，并提出禁烟章程八条，其内容跟林则徐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大都不谋而合。接着陶澍于当年十月在江苏扬州、苏州、南京及上海东关等地收缴烟土 16000 馀两，又强令海船交出烟土 41000 馀两，一并销毁。这是全国最早的大规模的禁烟、销烟行动，是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先声。十二月，他公布《沿海州县港汊、村庄设法稽查巡缉章程》，整顿海防，表现出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在鸦片战争中坚决抵抗侵略军的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姚莹等，都曾经是陶澍的部下。

其次，陶澍的经济改革，其所以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是因为使用了经济手段进行改革，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他的改革具有时代先进性，开了洋务运动乃至后代经济改革的先河。例如：官盐滞销，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私盐泛滥。因此，封建朝廷历来的主要办法是集中力量严酷地打击盐枭。陶澍却上奏折说：“然臣之所虑，不在于枭徒之冒法贩私，而在于小民之情迫食私。盐价太贵，则食私者众，而枭徒有不胜诛者矣。且贩私者，不尽在枭徒，商厮、商夥与运盐之江船夹带实甚。商力疲乏，彼方藉夹带以补成本之不足，是官商亦私。私愈多，而引盐益滞不行矣。”（《筹议盐务大概情形折子》）他于是在《筹议加斤减价、兼疏积引折子》、《请将淮北滞岸试行票引章程折子》等奏折中提出“减价敌私”的经济手段，具体办法就是实行盐票，利用广大

商人和民众的力量，打破纲商垄断。同时，他又注意保护商人正当利益，反对朝廷对商人的超经济盘剥。又如：陶澍经过深思熟虑与周密筹划，于道光六年实行海运，不是采用官运，而是采用商运，用经济政策调动商人积极性，调用民间运输力量，不仅及时而安全地运送了漕粮，而且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可惜的是，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及某些客观因素，海运在第二年就被迫终止。陶澍只好编了《海运全案》，并且亲自作序，总结经验，留给后人。陶澍逝世七年之后，即道光二十六年，由于河运根本无法供给朝廷的漕粮，道光皇帝才不得不下令复行海运，河海并举。到光绪年间，终于全部实行海运。此外，陶澍与林则徐还是币制改革的倡导者。道光十三年，陶澍与林则徐在《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子》中，提出自铸银币，用计量银币代替称量银块，适应了商业发展与保护本国经济的要求，启发了近代币制改革。而且，自铸银币本质上是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即“师夷长技”）的思想萌芽。

第三，陶澍为近代洋务运动作了人才准备。陶澍对八股取士表示不满，提倡兴办学院，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清末著名名士张佩纶在《涧于日记》中纪录说，光绪五年十一月，他与张之洞评论近世人才，认为“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涧于日记·己卯年》）他认为贺长龄、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都在不同方面禀承了陶澍的影响。后来，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理论，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他们都是由经世派而转化为洋务派的。

（三）陶澍是湖南由产生个别杰出人才到产生人才群体的先导。

研究湖南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特点：前一是唐朝以前，著名人物大多数是客籍人士，如：屈原、贾谊、张机、陶侃、杜甫、柳宗元等。二是近代以前，湖南只断续地产生个别杰出人才（如：蔡伦、周敦颐、王夫之），近代则产生了大批人才群体，在经世致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解放战争中，湖南人才群体都起了中坚作用。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共收鸦片战争以前名人 3332 人，湖南仅 22 人，占全国 0.66%。蔡冠洛《清代七百名名人传》，收名人 714 人，其中湖南籍名人 51 人，占 7.28%。这 51 人中，嘉庆以前仅 3 人，道光及道光以后 48 人，形成了近代在全国名列前茅的人才群体。

陶澍重视人才问题，每到一处都注意兴办教育。他说：“为政首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甄别并酌量调补折子》）他特别注意湖南人才的培养。在国史馆担任纂修时，就在写给湖南朋友黄花耘的信中，深深感叹道光以前湖南缺乏有全国影响的人才。因此，他主政以后，注意提携才能杰出的湖南人，成了近代湖南第一代人才群体的领袖。

陶澍对湖南人才群体的成长所起的巨大的先导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一、直接培养了一批政治领袖。如：受陶澍影响或培养的贺长龄、左宗棠、胡林翼、李星沅等，后来都官至巡抚、总督，成为政绩显赫的名臣。《清史稿·陶澍传》说：“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二、直接扶植了一批思想、学术精英。如：著名思想家魏源，湖南地方文献专家邓显鹤，以及汤鹏、唐鉴、贺熙龄等。三、陶澍培养或提拔的上述人才，又各自培养出一大批走向全国的湖南人才。所以，梁启超《儒家哲学》说：“清代中叶以后，湖湘学派中形成了一个经世之

学的重要派别。……湖南经世人才都集合在陶澍周围。”萧一山《清代通史》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也。”李瑚先生进一步说：“说自曾国藩起兵以后，湖南省始‘人才辈出’的话，是不够准确的。在陶澍周围的湖南籍人已不少，且多是博学多识之士，其中还有著名的改革派思想家，如魏源之流。因此可以说，陶澍上承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遗风，下启林则徐、魏源等务实变革思想新潮，成为江南地区领袖群伦的中心人物。”（岳麓书社《陶澍集·前言》）

10 | 总之，陶澍是中国古代近代之交的杰出政治家。他和林则徐、魏源等人一样，是中国由古代走向近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二、陶澍的著作

全面整理陶澍的著作，是研究陶澍的基础。《湖湘文库》此次整理的《陶澍全集》，是我国第一部基本上名副其实的《陶澍全集》。

诚然，在陶澍逝世的第二年，就有《陶文毅公全集》问世。该书共六十四卷，由许乔林校订，道光二十年（1840年）淮北士民公刊。但是，这部《陶文毅公全集》，只是一个按照奏疏、文集、诗集分类编纂的选本，不是名副其实的全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该书收录严重不全。1. 所收奏疏只占全部奏疏的四分之一。《陶云汀先生奏疏》与《陶云汀先生题本》，共收有奏疏1153篇，而该书仅收奏疏296篇。2. 文章收录不全。陶澍自编的《印心石屋文钞》已经收录的文章，该书就有几十篇没有收入。3. 没

有收录陶澍的专书《蜀輶日记》、《靖节先生集注》、《靖节先生年谱考异》等。过去，人们误认为这本《陶文毅公全集》是陶澍的全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的由故宫博物院主编的《故宫珍本丛刊》，其中第593册、594册《陶文毅公全集》，即影印该书；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的《陶澍集》，也是按照该书点校，并作了删节，只补充了《蜀輶日记》。这些都不是陶澍全集。

陶澍有多少著作呢？最早记述陶澍著作的人，是魏源和许乔林。魏源是陶澍的幕僚。陶澍刚逝世，魏源写的《陶文毅公行状》说：“公所著，有《印心石屋诗文集》五十六卷，《奏疏》七十六卷，《蜀輶日记》四卷，《陶桓公年谱》四卷，《陶渊明集辑注》十卷，《靖节年谱考异》二卷，《陶氏世谱》若干卷。又校勘《资江耆旧集》六十卷。”许乔林是陶澍的文友，担任海州书院山长。他在《陶文毅公全集·缘起》中说：“公自订《奏疏》七十六卷，《印心石屋文集》三十五卷，中阙第十六至第十九卷，《印心石屋诗钞》初集四卷、二集三卷，《抚吴草》四卷，俱先刊行。其未刊者，缥緗盈尺，传写滋讹。”此外，《资江陶氏七续族谱》所开列的陶澍著作目录中，还有《运甓斋词谱》、《谈瀛录》；陶澍在《省身日记序》中还提到在自己担任御史期间写了《省身日记》。

但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已经刻印的陶澍著作，只有《陶云汀先生奏疏》七十六卷，《陶云汀先生题本》八卷，《陶云汀先生奏疏补遗》十六卷，《印心石屋文钞》三十五卷，《印心石屋诗钞》初集（包括《出山草》、《玉堂草》、《江湖草》、《太史草》）四卷，《印心石屋诗钞》二集（即《皇华草》）三卷，《抚吴草》四卷，《蜀輶日记》四卷，《靖节先生集注》十卷，《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二卷。此外是陶澍署名主编或署名校刊的书籍，

主要有《海运全案》、《重浚吴淞江全案》、《云台新志》、《云台山唱和诗》、《安徽通志》、《水利七案》、《沅江县志》、《安化县志》、《洞庭湖志》、《莫江公诗文集》、《资江耆旧集》等。

陶澍有些著作，包括《印心石屋诗文集》、《陶桓公年谱》、《陶氏世谱》、《运甓斋词谱》、《谈瀛录》、《省身日记》等，今天已经难以找到。这些著作很可能已经失传。且以《印心石屋诗文集》为例进行推断。陶澍诗歌与文章最齐全的版本，应该是这本五十六卷的《印心石屋诗文集》。但是，我们查遍湖南、北京、南京、苏州、扬州、上海的主要图书馆，又托台湾学者检索台湾主要图书馆的藏书，都没有找到此书。我们经过反复琢磨，产生一种推断：这本书，在陶澍逝世时虽然编成了，但是没有及时刻印，没有流传。所以，许乔林校订《陶文毅公全集》时只字未提《印心石屋诗文集》五十六卷的刻本，而且说“其未刊者，缥緗盈尺”。后来，《资江陶氏七续族谱》开列陶澍著作，也没有提及《印心石屋诗文集》。可见，此书从未刻印。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呢？陶澍逝世后，连续发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南京兵荒马乱，连《陶云汀先生奏疏》七十六卷都是仓促刻印、校订粗糙，《印心石屋诗文集》当然就来不及刻印，而且连原稿也丢失了。《陶桓公年谱》等的情况应该跟《印心石屋诗文集》相似。

我们根据陶澍现存著作的情况整理《陶澍全集》，共分八册：奏疏（包括奏折与题本）及杂件共五册，文集一册，诗集及对联一册，专书一册。全集的基本结构体例是：主体版本，补遗，附录。首先选择最有代表性的版本作为点校的主体；然后补录主体版本没有收录的篇目，其中包括其他版本中保存的篇目以及我们新辑的篇目。跟陶澍著作密切相关而且有历史价值的材料，作为附录。

一、陶澍奏疏：以《陶云汀先生奏疏》与《陶云汀先生题本》为主体版本，而以《陶文毅公全集·奏疏》与《陶云汀先生奏疏补遗》等作为校勘的对照本。

《陶云汀先生奏疏》，共七十六卷。陶澍刚去世时，魏源写《陶文毅公行状》就说有《奏疏》七十六卷，可见此书在陶澍生前已经编好。但是，《陶云汀先生奏疏》七十六卷是三次才编成的。前二十四卷，署名李廷锡编。李廷锡，字康侯，号碧山，湖北安陆人，进士出身，曾经担任江苏昭文县知县，后来升任南安知府、南昌知府，官至按察使。中间二十八卷，即第二十五卷至第五十二卷，是黄冕续编的，黄冕在《跋》中说：“今续刻二十八卷：《抚苏稿》三卷，《抚苏兼署督稿》一卷，《江督稿》二十四卷。起道光九年正月，至十三年十二月。合初刻共五十二卷。”黄冕，字服周，号南坡，湖南长沙人，协助陶澍办海运、兴水利、改盐政，成就杰出。后面的二十四卷未署编者姓名，我们推断是著名思想家魏源续编的。魏源《陶文毅公行状》说：“源自弱冠入京师，及来江左，受公知数十载。曾命编次奏稿，并托以身后志状。”魏源明确地说，陶澍委托自己编次奏稿。

13

《陶云汀先生奏疏》有三种刻印本。第一种是二十四卷的初刻本，李廷锡编辑于道光八年。卷首有李廷锡写的序言与凡例，还有陶澍五十岁时的画像，以及道光戊子年（即道光八年）秋天朱方增写的题赞。第二种是五十二卷续刻本，卷末增加了黄冕的《跋》。这个刻本当代已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三种是七十六卷的完整刻本，卷首跟初刻本完全一样，卷末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说明具体刻印时间（馆藏仅著录道光年间）。我们推断，七十六卷本的刻印时间是在陶澍逝世几年之后。理由是：第一，陶澍逝世次年，许乔林刊印《陶文毅公全集》，只收全部奏疏

的四分之一，而且没有提到七十六卷本的《陶云汀先生奏疏》，可见当时还没有完成刊印。第二，七十六卷本后面的若干卷，校订特别粗糙，几乎每卷都有不少错别字，特别是最后几卷。如：第七十四卷，错误严重。该卷的《续获吴当运案内逸犯陈希友等审拟折子》，文字错误有30多处。第七十卷《恭谢特恩赏寿折子》，竟然只有目录，却漏收了正文。此外，目录与正文的篇名也没有完全统一。推究造成错误疏漏的原因，大概是为了纪念陶澍逝世而仓促刻印，又没有认真校订。因为，在陶澍逝世次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魏源离开了总督府，并先后两次奔赴浙江前线参与军事活动，无暇校订奏疏。因此，才造成了这种校订粗糙的情况。

《陶云汀先生奏疏》共收奏折1076篇，按照“历官先后”的顺序编排，包括侍御稿、巡漕稿、巡城稿、川东道稿、晋臬稿、抚皖稿、抚苏稿、江督稿。其中卷七十《特恩赏寿折子》，有目无文。实际上只有1075篇。

《陶云汀先生题本》八卷，是跟《陶云汀先生奏疏》前二十四卷同时编定、刻印的。题本又称题稿，是奏疏的一种。奏疏包括折子与题本。李廷锡《陶云汀先生奏疏序》说：“计折稿二十四卷，题稿八卷，凡三十二卷。起嘉庆甲戌，至道光戊子。”《陶云汀先生题本》，前三卷为《抚皖稿》，后五卷为《抚苏稿》，共收题本77篇。主要内容是题请旌表忠孝节义的人物，其中为长寿者请求旌表的有20篇，为节烈妇女请求旌表的有18篇，为殉难人物（包括抗清的明朝将领）请求旌表的有12篇，还有为捐款赈灾、修建学舍、捐置义田与义冢的官商士绅请求表彰的题本。

《陶文毅公全集》六十四卷中奏疏占二十九卷共296篇，只占奏疏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没有收录奏疏的拜发时间，奏疏后面附录的有关清单与中央部门的批复也往往没有收录。本书的价值

是：一、主要可以供校勘之用。《陶云汀先生奏疏》后面的若干卷，校订不精，几乎每卷都有不少错别字，而本书校订比较细致。二、本书有少量奏疏，可以补充《陶云汀先生奏疏》的遗漏。如：《陶云汀先生奏疏》第七十卷《恭谢特恩赏寿折子》，只有目录而漏收正文，即可以根据本书补充。三、本书把奏疏分为“谢折”、“漕务”、“海运”、“灾赈”、“盐法”等二十六项。虽然分类并不十分严密，但是，对读者了解陶澍的政绩，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还有几本书值得提出。第一本是《陶云汀先生奏疏补遗》十六卷，沈基庶等编辑。该书是对《陶云汀先生奏疏》前二十四卷的补充，共收奏疏 185 篇，所收奏疏止于道光十年六月的《兼署总督印务加宫保衔谢恩折子》。虽然该书跟七十六卷本《陶云汀先生奏疏》相比，没有新的篇目，但是其分类编辑的体例，无疑启发了许乔林对《陶文毅公全集》的编辑。第二本是湖南省图书馆藏的手抄本《清安徽、江苏巡抚奏疏》，从标题推断，该书可能编辑于清朝灭亡以后，所收是陶澍担任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期间的公文。该书没有奏折，但是所收的题稿七篇、杂件 58 篇，是陶澍其他作品集中所没有收录的。

两主体版本共有奏折和题本 1152 篇，这是陶澍的主要奏疏。我们补充的有：1.《陶文毅公全集》中的三篇奏疏，包括《恭谢特恩赏寿折子》一篇、挑浚浏河的折子两篇。2.湖南省图书馆藏的《清安徽、江苏巡抚奏疏》中的七篇题本。3.跟林则徐共同写的 11 篇奏折。从道光十二年至道光十六年间，两江总督陶澍与江苏巡抚林则徐共同署名的奏疏有 100 多件，其中大多数没有收入《陶云汀先生奏疏》，我们经过审慎选择，从清朝皇宫与军机处存档奏折以及《林文忠公政书》中，辑出陶澍奏折 11 篇。我们共补收 21 篇，本全集共收陶澍奏疏 1173 篇。